

目的论视域下非遗外宣翻译策略优化研究 ——以徽墨歙砚为例

崔凤珍 苗国新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 长春 130117

摘要: 徽墨与歙砚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外宣翻译在文化负载词处理、译文质量与内涵传递方面存在不足。探究徽墨与歙砚的外宣翻译, 不仅有助于加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也益于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因此, 本研究以目的论为指导, 结合音译、增译、意象显化等策略, 探讨徽墨与歙砚外宣翻译的优化策略。

关键词: 目的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 外宣翻译; 翻译策略; 徽墨歙砚

DOI: 10.64649/yh.shygl.2026010008

0 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正逐渐成为跨文化对话中一座重要的桥梁。非遗承载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积累的智慧, 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生动篇章。当非遗在世界的舞台上绽放, 不仅能让更多人领略中华文化的魅力, 也为世界真正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此外,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 是彰显中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1]。以徽墨与歙砚为例, 二者于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两者是中国文房工艺的杰出代表, 更是徽州文化底蕴与匠心的体现。推动此类非遗走向世界, 有助于提升文化软实力, 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然而, 徽墨歙砚的外宣翻译面临诸多困难。其一, 深厚的文化内涵与独特工艺中包含大量文化负载词和专业术语, 难以在英语中找到对应表达。其二, 中文文本中常见的修辞与诗学表达, 也为翻译带来挑战。本文从目的论角度出发, 探讨如何优化徽墨歙砚的外宣翻译策略, 促进其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 为更多同类非遗传播提供借鉴。

1 徽墨歙砚外宣翻译现状

徽墨与歙砚是中国文房四宝的重要代表, 既是徽州地域文化的瑰宝, 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然而, 其外宣翻译目前难以满足文化传播与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

从学术研究层面来看, 徽墨与歙砚外宣翻译研究数量偏少。CNKI等平台检索显示, 近十年相关论文多集中于历史溯源、工艺技法和艺术鉴赏, 如制作技艺传承、审美价值探讨等。而很少有学者直接研究徽墨歙砚外宣翻译策略, 以及跨文化传播效果的专题。仅有极少数论文

在探讨非遗外宣时略有提及, 但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

从官方和市场的宣传材料来看, 翻译的缺失和质量不均的问题尤为突出。官网英文内容存在明显不足: 一是翻译严重缺失, 大量核心文本无英文版本, 阻碍国际受众理解; 二是质量参差不齐, 部分译文仅作简单名词对译, 未能传递文化内涵, 甚至存在表达生硬等问题, 难以实现有效跨文化交际。

此外, 非遗在国际传播中的翻译支持明显不足。例如徽墨歙砚虽已列入国家级非遗, 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平台上的介绍往往过于简略。现有译文不仅缺乏准确深入的表达, 更难以传递其工艺、寓意与历史背后的文化感染力。译名不规范统一, 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们的国际影响力。因此, 本文旨在通过相应翻译策略的探讨, 提升外宣译介能力, 为徽墨歙砚的有效对外传播提供支持。

2 理论依据

目的论是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 于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诞生。德国翻译理论家汉斯·弗米尔在《普通翻译理论的框架》一文中首次提出该理论的基本框架。之后他在与凯瑟琳娜·赖斯合著的《普通翻译理论基础》一书中对其进行了完善, 从而确立了其在翻译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翻译目的是一切翻译行为的根本原则, 即目的决定方法。^[2]

翻译目的论包含三大原则, 分别是目的原则 (Skopos Rule)、连贯原则 (Coherence Rule) 和忠实原则 (Fidelity Rule)。其中目的原则是首要原则, 另外两个原则都要从属于它, 共同指导着整个翻译过程。在非遗外宣翻译中, 目的原则对应译文功能定位, 忠实原则关乎文化信息准确传递, 连贯原则则确保语篇可接受性, 三者共同构成徽墨歙砚翻译策略优化的理

论基础。

3 目的论视域下徽墨歙砚外宣翻译优化策略

翻译策略的制定需紧密围绕非遗外宣的核心目的，即有效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国际认同。同时在目的论的指导下，构建准确、流畅且易于目标受众接受的译文。

3.1 目的原则导向下的翻译定位与策略选择

目的原则强调翻译行为的一切策略与方法均须服务于译文的交际目的^[3]。对于徽墨歙砚而言，其外宣翻译的核心目的在于向国际受众准确生动地传递其特有的工艺价值、历史底蕴与文化精神。为实现此目的，译者首先需依据文本类型与使用场景明确译文具体的功能。

在翻译实践中，目的原则指导译者灵活采用翻译策略。对于徽墨与歙砚这类核心文化专有项，若仅采用拼音转写（如 Huimo、Sheyan），虽能保留语音却丢失文化内涵。因此，可依据目的原则采用“音译+类别词/解释性增译”的策略，如译为“Huimo (Huizhou Inkstick)”或“Sheyan (She Inkstone from She County)”。

针对蕴含深厚文化寓意的表达，如“徽墨如玉，温润坚贞，喻君子之德”，若直译其比喻意象为“like jade”，读者难懂其与“君子之德”的关联。此时，应以文化传播为目的，采取“意象保留+寓意显化”的策略，试译为：“Huimo is often compared to jade for its smooth texture and steadfast quality, metaphors that symbolize the virtuous character highly esteemed in the Chinese literati tradition.”通过增补“symbolize the virtuous character”和“Chinese literati tradition”等解释，译文将中文的含蓄隐喻转化为可理解的文化信息，实现了跨文化交际的根本目的。

3.2 忠实原则框架下的文化信息准确传递

忠实原则要求译文在内容与形式上贴合原文的核心信息。在徽墨歙砚的翻译中，忠实性首先体现为关键工艺术语与制作流程的准确翻译。对于“松烟墨”“罗纹砚”“金星砚”等特定工艺品类名称，应避免简单音译或随意意译，采用“专名音译+技术性注解”的策略。例如：“松烟墨”可译为“Pine-soot Inkstick (made from the soot of specially burned pine wood, renowned for its deep, glossy black tone and durability)”；“罗纹砚”可译为“Rib-patterned Inkstone (named for its natural, silk-like ribbing, which indicates fine texture and excellent ink-grinding properties)”。括号内的注解并非多余，

它不仅是对术语工艺特征的必要说明，还是对原文的忠实再现。

对于涉及历史脉络与发展的表述，忠实原则要求精确转换时间信息与文化背景。如原文“歙砚雕刻技艺在唐宋时期达到艺术高峰”，若“唐宋时期”直译为“Tang and Song dynasties”，国际读者可能对“唐宋”的历史跨度与文化地位缺乏了解。遵循内容忠实，可优化为：“The carving art of She Inkstone reached an artistic peak during the Tang (618-907) and Song (960-1279) dynasties, periods renowned for cultural flourishing in Chinese history.”增补公元纪年和对时代特征的简要说明，可以更完整地传递原文的历史信息，便于读者理解。

3.3 连贯原则指导下的语篇重构与文化调适

连贯原则要求译文流畅自然，贴合目标语读者认知。译者须理解原文，调整语篇结构与表达方式，实现语内连贯与文化连贯。中文介绍性文本往往会运用四字短语排比的句式和侧重意境营造的描述方式^[4]。此外中文是意合语言，逻辑不太明显，而英文是形合语言，常采用连接词显化逻辑。例如：“徽墨，黝黑发亮，入纸不晕，历久弥新。”若逐字直译，则易导致译文逻辑混乱。依据连贯原则，译者可整合信息点，添加连接词，建立显性逻辑连接，并转化为符合英语说明文风格的句式。可优化为：“Huizhou Inkstick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deep, lustrous black color that resists bleeding on paper and remains stable over time.”通过使用“is characterized by”、“that”引导的定语从句使描述更紧凑，逻辑关系更清晰。

文化层面，连贯原则要求补充文化信息以调适文化差异。对于“文房四宝”这一文化负载词，若直译为“Four Treasures of the Study”，读者可能会难以理解。此类术语可采用“直译+同位语阐释”策略，译为“the Four Treasures of the Study (namely, the brush, ink, paper, and inkstone), which are essential tools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语境信息的补充益于读者理解中国文化。对于涉及中国历史人物或典故的内容，如“歙砚制作技艺传承自南唐李廷珪的制墨古法”，需在译出核心信息的同时，酌情补充背景解释（如“Li Tinggui, a master ink-maker of the Southern Tang Dynasty (937-975) renowned for inventing high-quality solid inkstick that dominated the imperial court and literati circles”），帮助目标语读者了解关键历史人物和时代背景。这种译法可去除因文化差异导致的理解障碍，确保语篇在目标语文化语境中的顺畅传递。对于原文包含的独

特文化概念，翻译时若不能在目的语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表达，则应优先保证核心文化信息的可理解性。此时，采用增益或阐释等手段，不是对原文的不忠，而是为了在目标文化语境中实现更深层次的有效传递^[5]。

4 结语

全球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非遗外宣翻译是推动文化走出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本文以

翻译目的论为指导，构建“精准定位—文化保真—语篇适配”的三段式翻译路径，解决徽墨歙砚外宣中的三大难题：文化负载词传递失真、文学性表达生硬、跨文化认知隔阂。提出“音译+类别词增译、意象保留+寓意显化、术语注解+背景补充”等策略，在传承与传播之间寻求平衡。未来研究应扩大材料范围、深化理论应用、关注读者反馈，逐步建立系统的非遗翻译规范，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提供支撑，促进文明互鉴。

参考文献：

- [1] 王琦. (2024). 目的论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研究 —— 以贵州彝族“撮泰吉”为例 [J]. 英语广场, (12), 34-37.
- [2] Vermeer, H. J. (1989).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 Heidelberg: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 [3] 谷峰. (2018). 目的论视角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宣翻译研究 —— 以徽州民歌、黄梅戏的英译为例 [J]. 长春大学学报, 28 (9), 31-34.
- [4] 许敏, 王军平. (2016).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概念的英译研究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4 (2), 108-112.
- [5] 王振国. 新英汉翻译教程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作者简介：崔凤珍（1999.11—），女，汉族，安徽省阜阳市，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苗国新（1977.12—），男，汉族，吉林省长春市，硕士，教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